

中国特色外国文学批评的生产及其国际传播路径探索

——以《丹·布朗现象诠释》的海外出版为例

刘略昌

摘要：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批评的生产和国际传播有助于增强文化软实力，扩大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在丹·布朗小说成为世界文化景观、阅读的勃兴与批评的滞后存在巨大反差的背景下，由中美两国学者合作撰写、英国剑桥学人出版社推出的《丹·布朗现象诠释》聚焦全球读者共同关注的话题，积极介入国际学术共同体的研讨。它把翻译与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从中国视角出发审视丹·布朗的小说创作。采取中外合作的著述模式，选择国外主流的出版机构，照顾到中外潜在阅读语境的差异，《丹·布朗现象诠释》在学术生产的各个环节对具有中国特色外国文学批评的生产及其国际传播的路径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关键词：中国特色外国文学批评；学术生产；国际传播；《丹·布朗现象诠释》；话语权

作者简介：刘略昌，男，副教授，文学博士，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入选人。（上海理工大学 外语学院，上海，200093）

中图分类号：G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 (2019) 01-0025-06

哲学社会科学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的迅速崛起，哲学社会科学对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作用曾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积极肯定。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1]。其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国特色凝练及其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因为理论的生命力和传播力终归在于其特色和原创性。

鉴于哲学社会科学涉及的学科门类众多，本文仅以笔者从事的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为例，探索新形势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批评走向世界的可能路径。在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广义的哲学社会科学当中，外国语言文学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从理论上来讲，中国的外国语言文学研究较好地融国际化和本土性于一体：外国语言文学系文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其批评对象涵盖外国语言研究、外国文学研究、翻译研究、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区域和国别研究五大领域，研究对象本身具有高度国际化的色彩。不同于外国的同行，中国的外国语言文学学者总是立足于中国的国情，从中国人的知识结构和需求出发进行显性或隐性的比较研究，学术成果无形之中烙有中国制造的印记。从上述两个特性来看，中国的外国文学批评理应走在中华学术国际传播和话语体系建设的最前沿。但综观当前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著作，可发现它们主要以两种形式存在：用中文写作，在中国出版；用英文写作，在中国出版。也就是说，研究针对的读者群体和学术成果的传播范围主要局限于华文世界，而未与国际学术共同体形成积极有效的交流。

在国家号召要坚定文化自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强国的今天,这样的研究格局已经无法满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烈诉求。为推动更多的中华学术著作走向世界,国家于 2010 年设立了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在推出一批高质量译著的同时,该项目固有的弊端也显而易见:一是资助项目数量太少,二是出版时间滞后许多。作为在中国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与其被动接受政府主导的这种配额供给,还不如主动发挥外语功底好且熟悉西方学术界的优势,直接用外文撰写且在国外出版学术著作,面向全球学术共同体发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声音。在这样的背景下,由英国剑桥学人出版社(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发行、中美两国学者联手打造的英文专著《丹·布朗现象诠释》(*The Dan Brown Craze: An Analysis of His Formula for Thriller Fiction*, 2016)可以说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范例。该书共分 7 章,它从小说美学、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等多个维度出发,对迄今为止丹·布朗出版的几部小说予以了共时的剖析,对丹·布朗创作的发展嬗变及其与美国文学传统的关系进行了历时的考察。无论是在论题选择、内容撰写还是出版流通等学术生产的各个环节,《丹·布朗现象诠释》都有着谨慎的考量,它对新形势下独具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批评成果如何走向世界、参与国际交流、贡献中国智慧、增强国际影响力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一、论题提出与选择突破

学术论题的提出是一切科学研究和理论创新的起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学术创新的过程也就是发现、筛选、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尽管我国是个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2]。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水平相较自然科学略显落后的情况下,要想真正参与甚至主动引领国际学术界展开研讨,最好的办法就是聚焦国际学术共同体都在关注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丹·布朗现象诠释》做出了非常巧妙的选择。该书的第一作者在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爱伦·坡(Edgar Allan Poe)、丹·布朗、海外汉学家等研究领域有着较为深厚的积累,其中的福克纳研究和爱伦·坡研究还曾受到学界前辈陶洁、盛宁等人的高度好评。但此番进军国际学术界,之所以选择成为世界文化景观的丹·布朗小说作为突破口,作者显然是有着介入学术热门话题、进行中国言说的考量。丹·布朗 1998 年即已出版处女作《数字城堡》(*Digital Fortress*),但只有随着《达·芬奇密码》(*The Da Vinci Code*)在 2003 年的问世,整个世界才掀起了一股阅读布朗文化悬疑小说的热潮:迄今为止丹·布朗的小说被翻译成 56 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纸质版的全球销量达到了惊人的 2 亿册。丹·布朗小说产生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它使出版行业摆脱了不断衰微的态势,重新激起了人们对达·芬奇和基督教早期历史的兴趣,同时它还带动了罗马、巴黎等地旅游业的兴旺发达。2005 年,丹·布朗被《时代》杂志评选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一百位人物之一。

图书的阅读和批评总是如影随形,布朗小说的全球热销无疑引发了相关批评的产生。以美国亚马逊网为例(检索时间为 2018 年 5 月 20 日),布朗 2017 年才问世的小说《起源》(*Origin*)点评即有 6959 条,《地狱》(*Inferno*, 2013)、《失落的秘符》(*The Lost Symbol*, 2017)和《达·芬奇密码》几部小说的评论也分别达到了 21053、5550 和 4933 条。这些数量众多的网上评点虽然呈现出碎片化和感性大于理性的色彩,但却折射了普通读者的兴趣所在。国外职业化的布朗批评多属个案探讨,主要围绕《达·芬奇密码》和《地狱》两部小说展开,批评的切入点比较单一:《地狱》批评多为浅表化的阅读

指南,《达·芬奇密码》研究则不外乎“引用圣经中的只言片语和一些与他们立场一致的专家的观点来反驳布朗在《达·芬奇密码》的描述,从而进一步阐述和支持他们自己的论点”^[3]。系统而又深入地研究丹·布朗小说创作的成果数量不多,除了一本传记之外,大多是从神学的视域出发解析布朗的小说与基督教的关联,如《丹·布朗的福音书》(*The Gospel According to Dan Brown*, 2006)和《天主教与美国文化:为什么丹·布朗的主张引起了共鸣》(*The Catholic Church and American Culture: Why the Claims of Dan Brown Struck a Chord*, 2009)。虽然未能与肇始于美国的“达·芬奇密码现象”同步,但自2004年《达·芬奇密码》的汉译本出版以来,丹·布朗却在国内出版界和学术界创下了许多记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其他海外作家在其有生之年全部作品都被翻译到了中国,没有任何一部其他的外国文学译著短短几年内就拥有如此巨大的销量,没有其他的国外作家一直以来同时受到普通读者、学人和出版商的普遍青睐。国内的丹·布朗研究成果多刊载于报纸杂志,研究专著除了《解密丹·布朗》之外,另有探究中译本如何把源文本中的模糊语言译为目标文本的,如《文学中的模糊语言与翻译:以〈达·芬奇密码〉中英文本比较研究为例》(商务印书馆,2011)。从海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丹·布朗小说依然存在相当大的挖掘空间:目前的研究明显缺少开阔的世界文学文化视野的关照,更缺少对小说的未来走向及其出路等系列问题的深层解析。在《解密丹·布朗》等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英国出版的英文专著《丹·布朗现象诠释》进行了适当的拓展。虽说选择从文学而非神学的视角切入,“无意激起争议或否定他人的见解”^{[4](8)},但《丹·布朗现象诠释》注定会给全球热议不断的丹·布朗小说阅读和批评再添波澜,会为之提供一个有别于以往、有别于域外的中国思考视角。

二、译研相长与批评自觉

孔子曾经说过:“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其实,决定哲学社会科学批评传播效果的除了文采,最重要的莫过于作品的质量,这在学术专著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丹·布朗现象诠释》一书内容厚重,有大量的相关研究作为支撑,具有较为扎实的研究根基。文学批评往往始于文本细读,而读得最为仔细认真的应首推译者,因为译者不像普通读者那样可有选择性地跳过某些章节、段落或字句,而必须读懂读透全书之后方能执笔进行移译,这样的水磨工夫不是常见的浅表阅读所能相比。《丹·布朗现象诠释》的第一作者有丹·布朗的“御用译者”之称,他翻译了《达·芬奇密码》《数字城堡》《天使与魔鬼》(*Angels & Demons*)等布朗的系列小说,这些译本均在国内引发了极大的反响。以此为起点,作者还主持译介了《〈达·芬奇密码〉背后的男人:丹·布朗传》(*The Man Behind The Da Vinci Code: An Unauthorized Biography of Dan Brown*, 2005)、《破解〈达·芬奇密码〉》(*Breaking The Da Vinci Code*, 2004)和《达·芬奇骗局:真相竟比虚构还离奇》(*The Da Vinci Fraud: Why the Truth Is Stranger Than Fiction*, 2005)等多部与之相关的著作。《新民晚报》如是说道:译好一部密码,掉了多少头发;译罢一部城堡,少睡多少好觉;译完一部破解,累得差点吐血;译就一部魔鬼,平添多少皱纹。^[5]这样的话虽然主要讲的是译事之艰辛,但也从一个侧面指出了译者在研读布朗小说方面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丹·布朗现象诠释》的作者不但翻译布朗的系列小说,而且还对这些具体的翻译实践进行总结,对之以学理层面的提升,指出布朗小说在国内引起的轰动效应表明:译作在目标语读者中能否被成功接受与翻译过程中译者的美学理念和各种思维的交相运用密不可分。^[6]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深化了对丹·布朗小说的认知,《丹·布朗现象诠释》的主要作者曾在《当代外国文学》《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等重要刊物发表布朗系列研究论文,还指导研究生发表了多篇对丹·布朗小说进行文本细读的

文章。左手翻译批评与实践，右手文学研究，《丹·布朗现象诠释》的作者游走于文学研究者、翻译家和翻译批评家之间，多重身份和多层观照使《丹·布朗现象诠释》的撰写具备了较为开阔的视野和较为独特的思路。

译研相长的举措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著作的质量，但作为主要出自中国学者之手的《丹·布朗现象诠释》，还应该具有中国学者的主体意识和批评自觉，这也是时代发展、国家战略和学术进步必然会提出的要求。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经历了一个以翻译推广为主、到逐渐进入系统研究、再到全面清理已有的学术成果及其研究方法这样几个阶段。外国文学研究的演变历史表明：一代代学人在接受外国文学方面的认知不断趋于深入，研究者的主体意识逐渐得到确立。在外国文学学科建设趋于成熟的今天，《丹·布朗现象诠释》毫无疑问地彰显了当代中国学人应有的文化自觉。这种自觉首先体现在著者对国内的布朗阅读和批评进行了探微索隐：在过去的十余年中，中国始终是横扫整个世界的“丹·布朗热”的重要组成部分，仅在 2004 年《达·芬奇密码》的中译本就重印了 17 次。除了美国之外，在布朗小说的销量及其研究方面，还没有其他国家能与中国相比肩。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4 年 7 月，中国在丹·布朗研究领域共发表了 110 篇期刊论文、46 篇硕士学位论文和 1 篇博士学位论文。不同于美国，中国的丹·布朗研究往往淡化或一笔带过其中的基督教教义之争，转而更加关注布朗小说的分类归属问题，也就是说布朗的作品究竟属于雅文学还是俗文学。此外，小说审美批评和平行比较也是中国丹·布朗批评的与众不同之处。在面向全球读者阐释丹·布朗时，《丹·布朗现象诠释》自觉地增添了中国制造的色彩，分别勾勒出了丹·布朗在中国的阅读、研究及其对中国作家产生影响的这道具有强烈地域色彩的东方文化景观。

《丹·布朗现象诠释》一书的批评自觉还体现在著者博采众长，融通了中外古今的理论资源对布朗的小说予以观照。长期以来，我国不少的外国文学研究者言必欧美，过度迷信西方理论，其研究成果的创新性和自主意识屡遭其他学科学者的质疑和诟病，但《丹·布朗现象诠释》却没有落入文化自我殖民的陷阱。作为研究美国文学的学术专著，《丹·布朗现象诠释》一方面倚重西方的理论资源，如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Aspects of the Novel*, 1956）、伊瑟尔的《阅读的行为》（*The Act of Reading*, 1980）、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1982）等经典理论著作仍是作者考察布朗小说必不可少的工具。另一方面，《丹·布朗现象诠释》也大量引入了中国的文论和文化研究成果，其参考书目中列举的出自中国学者的著述多达 25 种，其中包括专著/论文 23 部/篇，译著 2 部。为《丹·布朗现象诠释》提供借鉴的中国思想资源种类非常多样化，其中既有金圣叹的《水浒》和《西游记》品读、毛宗岗的《三国演义》评点、李渔的《闲情偶寄》曲论和苏轼的文艺思想等感悟式的中国古代文论，也有叶朗的《中国小说美学》、杨仁敬的《美国后现代小说论》、杨恩寰的《西方美学思想史》等现当代中国学者的观点论说。翻阅《丹·布朗现象诠释》，鲜见著者生搬硬套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和方法，相反却处处可见中国文论和中国话语有机地融入了小说细析之中。例如，分析《数字城堡》的创作技巧时，作者指出该小说的叙事结构类似中国人讲故事和创作小说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传统。《丹·布朗现象诠释》继而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释：“‘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源于宋朝的说书表演，是说书人在一个故事中讲述两件同时发生的事情时所用的口头语。后来，这种双重或多重叙事结构出现在许多小说当中。”^{[4] (86)} 通过在小说分析中融入中国话语的做法，《丹·布朗现象诠释》巧借东风之力，悄无声息地激发了海外读者对中国文学产生进一步了解的需要。

三、中美合璧与媒介选择

出版和传播也是学术生产链条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对此，《丹·布朗现象诠释》显然也有着多方面的考量。在图书策划上，《丹·布朗现象诠释》进行了中外学者合作的尝试。该书的第二作者现任教于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启科分校，他在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后于1993年前往加州任教。长期在美国求学工作，身为华裔的张爱平对西方的学术运行规则极为熟悉。《丹·布朗现象诠释》两位著者的治学理念非常吻合，他们不但谙熟中国和西方的历史文学，擅长文本细读和比较研究，而且对丹·布朗的小说及其世界影响有着浓厚的兴趣。以国际通行的学术规则，向世界贡献中国学者的智慧，阐述中国人如何阅读和研究丹·布朗构成了两人策划《丹·布朗现象诠释》共同的动机。

在出版机构的选择上，《丹·布朗现象诠释》也着实花了一番心思。为了促进世界对中国的认知，CCTV曾与BBC联合拍摄并共同发行纪录片《美丽中国》，该片在世界创下了相当高的收视率并荣获了“艾美奖新闻与纪录片类”的几项大奖，可以说作为世界主流传播媒介的BBC在该片的好评如潮中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与之类似，《丹·布朗现象诠释》选择的也是一家非常权威的出版社——英国剑桥学人出版社。众所周知，出版学术专著往往存在一定风险，因为学术著作销量一般不会太大，不会像通俗图书那样带来丰厚的回报。但专事学术出版的剑桥学人出版社却坚信，只要将图书投放到合适的市场，其价值自然会被人发现。该社支持思想创新，秉承作者至上的理念，鼓励作者以自己的方式呈现作品，从而最大程度地保持论著思想的完整。除了尊重作者之外，该社还非常注重图书的宣传营销。剑桥学人出版社坚持走国际化路线，其85%的图书销售额来自英国之外的国家和地区。通过在《伦敦书评》《纽约书评》《泰晤士文学增刊》等报刊登载广告，发布书评，剑桥学人出版社争取让其产品在目标市场能得到更多的曝光。剑桥学人出版社的市场渠道畅通，通过Amazon、Blackwell、Baker & Taylor等全球书商和发行商进行产品销售。此外，它还与美国、中国、印度、中东等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发行伙伴建立了密切的合作。支持学术创新，不收取作者丝毫费用，而又特别擅长图书推介，剑桥学人出版社自然成了《丹·布朗现象诠释》实现国际传播的最佳选择。

除了图书策划和出版选择，《丹·布朗现象诠释》还在具体行文中做了一些调整，以达到更好的国际传播效果。传播又名传通，就是“受众运用已有的知识、经验，认识和理解传播的内容，如果受众对传播的内容缺乏理解，这种分享就不能真正实现”^[7]。《丹·布朗现象诠释》一书中融入了许多中国的文学、文化和研究成果，而由于语言障碍和思想偏见等原因，这些中国制造的思想并不为西方读者所熟知。为了减少跨文化传播的阻力，作者有意在书中增补了一些文字，添加了不少的注释。如在提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时，《丹·布朗现象诠释》插入了同位语“中国最具盛名的出版机构”^{[4](9)}，以对该出版社的地位做进一步的补充说明。在提到陆建德时，又加入了同位语“著名文学批评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4](13)}。显然，作者是注意到了潜在阅读语境的差异，因为汉语语境中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到了国际社会可能就成了相对陌生的他者。必要时，《丹·布朗现象诠释》还在插入同位语的同时，又添加必要的注释。如在第46页、52页和367页，作者分别对夸父追日的故事含义、李汝珍和冯梦龙的生平创作做了适当的介绍。以丹·布朗为媒介，通过添加异质元素而又不加大阅读障碍，《丹·布朗现象诠释》在国际英语学术界和出版界悄然插上了一面飘舞的五星红旗。

四、余 论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曾言，“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其实，如同文学创作一样，哲学

社会科学的学术生产也深受时代变化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和“一带一路”倡议得到普遍认可的形势下，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中国的迅速崛起促使世界渴望能更好地认识中国，而中国也希望能不断扩大自身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能力和影响范围。中国的美食向来在世界享有盛名，但世界需要了解的除了舌尖上的中国，更有学术的中国、理论的中国和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这一切都将为学术创新和哲学社会科学批评的繁荣提供强大的动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时代既然提出了新的重大命题，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就需主动对此做出回应。《丹·布朗现象诠释》就是这样一部呼应时代诉求、直面国际市场、既有世界文化视野又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著作。它从论题选择、内容撰写到出版流通等学术生产的各个环节都做了精心的准备，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国际传播的可能路径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相信《丹·布朗现象诠释》必将受到业内人士相当的好评，它也必将会对如何更好地发挥哲学社会科学批评的作用、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带来一定的启示。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EB/OL]. http://www.xinhuanet.com/2017-10/27/c_1121867529.htm, 2018-9-1.
- [2]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6-5-19.
- [3] 莉萨·罗格克. 《达·芬奇密码》背后的男人：丹·布朗传 [M]. 朱振武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162.
- [4] Zhenwu, Zhu & Aiping Zhang. (2016). *The Dan Brown Craze: An Analysis of His Formula for Thriller Fiction*.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ly Publishing.
- [5] 朱振武. 后记 [A]. 解密丹·布朗 [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346.
- [6] 朱振武. 相似性：文学翻译的审美旨归——从丹·布朗小说的翻译实践看美学理念与翻译思维的互动 [J]. 中国翻译, 2006 (2).
- [7] 郑兴东. 受众心理与传媒引导 [M]. 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4: 99.

[责任编辑：赵晓兰]